

听老总统讲中国故事

翁东辉

去维也纳“潘基文基金会”办公室拜访奥地利前总统海因茨·菲舍尔，86岁的他仍十分忙碌，除了应邀出席一些重要社会活动，他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上班，会见访客。老先生依旧穿着那套常见的浅灰色西服，搭配蓝底红斜纹领带，身姿挺拔，精神矍铄。

他站在门口满脸笑容招呼我们。这是一间很普通的办公室，40平方米左右，进门左手是一张简易办公桌，靠墙是一排矮书柜，柜子上摆放着照片以及奥地利、欧盟小旗，引人注目的还有两件龙窟青瓷。墙上挂着4幅抽象派画作。右手边是会议室，一张玻璃台几，4把灰色布面圈椅。仅此而已。

落座后，菲舍尔沉吟片刻便开始侃侃而谈，讲述他与中国将近50年的不解之缘。

“我1938年出生在施蒂利亚州的格拉茨。小时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从上学起就对中国感兴趣，在中学历史课上学过关于中国的知识，知道这个伟大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从那时起，我同中国的故事一直延续至今。”

菲舍尔上大学时主修法律和政治，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很关心中国时政，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他至今仍记得一些内容。他说，毛泽东在很早时期就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带领革命队伍长征，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正是很多人的牺牲，才有了1949

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上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舞台风起云涌。欧洲与中国交往不多，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很少，欧洲与中国的人员往来还很罕见。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随着中美关系松动，欧洲国家也尝试着与中国开展民间交流。菲舍尔就是在那个时候作为较早的一批欧洲人来到了中国。

“1974年初，我和妻子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奥地利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71年起，我就是奥地利国民议会的议员。我记得，承认新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奥地利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多数奥地利人民都赞成与新中国建交。”

“这次中国之行，我们先去了北京，然后去了上海、广州、香港。故宫等名胜古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街景与欧洲截然不同，道路交通以自行车为主，汽车相对较少。城里给人感觉非常安全，你只能看到极少数外国人，后来我碰到一个瑞典人，我自然而然地就认为他是我的同胞。”

“印象比较深的是去长城旅游。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坐在驻华使馆的车里，出城后一路上都在驴车和牛车中穿行。因为当时服务设施很少，也没有什么可买的東西，我们自己随身带了一些吃的，就在长城脚下支起一张小折叠桌野餐。现在想想还很有意思。吃饱喝足后爬长城，几乎没有游客，只碰到一名士兵在巡逻。”

也许是“当好汉”的经历很难忘，菲舍尔讲完这段，稍稍停顿一下，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之中。

“我喜欢上海，印象非常深刻。上海城里有许多街道巷子，道路左右两边种了很多梧桐，还有很多一层或两层的洋房。除了外滩有几幢银行大楼，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高楼大厦在当时都是

没有的。”

菲舍尔说，他旅行回来后，逢人就讲中国的事情，朋友们更是百听不厌。

作为奥地利知名政治家，菲舍尔196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75年至1983年，他担任奥地利国民议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之后被委任为联邦科研部长。1990年，他当选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并连任3届。2004年4月他赢得总统选举，在2010年获得连任。2017年退休后，他应好友卡明斯基教授的邀请担任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全身心投入促进中奥友好交流事业，乐此不疲。

奥中友协成立于1971年，是奥地利政府及执政党所支持的对华友好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中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及相互了解，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关系。

“我接触奥中友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奥地利的主要政治家都是奥中友协的成员。卡明斯基当时还很年轻，是奥中友协的活跃分子。”

“我原计划于1976年夏天随奥中友协代表团访华。但在访问之前，中国发生了大地震。为此我们决定推迟行程，到了年底终于成行。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司法部长，环境部长、前财政部长以及几位议员都在代表团之列。这是我第一次不以私人身份出访中国。我们与中国的许多机构进行了接触，了解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至今我还记得，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们外出时总随身带着暖水袋和热茶水来取暖。”

“上世纪80年代，我曾作为奥地利政府科研部长，率领由奥地利科学院、维也纳大学等机构的学术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我们参观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并建立起联系。”

菲舍尔会见过许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这大概同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是分不开的。菲舍尔讲到最后有点动情。

他说：“我已经去过中国10次了，可能还会有第11次。奥中建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往都得到了加强。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保

持着惊人的速度和无与伦比的活力，现在的中国对世界有着更大的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强调对世界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同等重视。马耳他总统曾经对我说过，中国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多次强调，中国既重视大国，也重视小国。这一点我们奥地利也深有体会。”

“尽管中欧关系现在存在问题，例如在高科技方面限制等，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不管怎样，中欧之间应该保持充满信任、彼此体谅的关系。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不公平对待过欧洲，但欧洲在18世纪至19世纪对中国并不公平。我们有义务使中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发展和平与公正的关系。我认为中国和奥地利的双边关系非常重要，中国和欧洲的双边关系更是如此。中欧双方应努力保持良好关系，并进一步深化。”

他说，奥中友协在推动中奥关系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年，故宫博物院将到维也纳举办中国展，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也会到北京办展。非常期待有更多这种重量级的文化艺术交流。

86岁的老总统很健谈，奥中友好情谊在其娓娓道来中缓缓流淌，菲舍尔先生仍在不遗余力地续写奥中友谊新故事。

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哈尔施塔特。(视觉中国)



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视觉中国)



脑洞

□ 杨啸林

大堡礁“愁白了头”

受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珊瑚礁白化现象正变得愈加严重。

据记载，历史上发生了3次较为严重的全球珊瑚礁白化事件，分别在1998年、2010年以及2014年至2017年。相关组织观察称，目前全球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第四次全球珊瑚礁白化事件。自2023年年初以来，已有超过53个国家和地区记录了珊瑚礁白化现象，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澳大利亚大堡礁。

今年4月，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发布报告称，大堡礁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白化事件，整体珊瑚礁群的四分之一出现了白化迹象，近40%的珊瑚礁“高度或极度白化”。

所谓珊瑚礁白化，是指当海水温度长时间高于正常温度，珊瑚和藻类之间的共生关系会被破坏，由此出现一种“热应激”现象。在正常情况下，藻类可通过光合作用满足珊瑚约90%的能量需求，并赋予珊瑚美丽的色彩。但在高温下，藻类会产生对其自身和珊瑚都有害的分子，珊瑚为避免受害会把藻类“驱逐”到体外。此举从短期来看对珊瑚细胞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却伤害很大。珊瑚不仅会因为失去藻类而变得透明，造成“白化”，还会因失去营养供应而面临死亡的风险。

此外，珊瑚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聚集形成，海洋温度升高会导致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快速繁殖，增加珊瑚虫及其共生藻类的患病风险。研究人员发现，海洋温度升高会加剧珊瑚虫群体病毒爆发，导致珊瑚虫的共生藻类死亡，使珊瑚礁遭到破坏。

珊瑚礁不仅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渔业、旅游业等发展也息息相关。以澳大利亚大堡礁为例，目前每年来自全球约200多万名游客前往此处观光游玩。此前，大堡礁基金会曾委托德勤经济研究所对大堡礁的经济和品牌价值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大堡礁的经济价值为560亿欧元，超过12座悉尼歌剧院。

针对大堡礁白化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建议将其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并呼吁有关国家和地区采取更多举措遏制这一趋势。比如，澳大利亚已经着手在一些脆弱地带严格控制捕鱼活动、管控污染排放行为。同时，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也纷纷加紧科研攻关，从珊瑚和藻类的共生关系着手拯救珊瑚礁。

目前关注度较高的一项技术名为“定向进化”。澳大利亚大堡礁基金会利用该技术培养出黄藻等微藻。在长达4年的时间中，这些微藻逐步适应了越来越高的温度，降低了自身被珊瑚“驱逐”的可能性。

研究人员还从健康的珊瑚礁中收集多余的生长细胞，建立起海上“托儿所”，一边培养珊瑚幼虫，一边将相关藻类放入其中。由于藻类被引入幼虫中的时间远远早于在自然界中的时间，因而双方可以更好且更早建立起共生关系，从而更好地生存。

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基于珊瑚本身展开的。目前，研究人员正在从世界各地寻找对海水升温具有更高适应性的珊瑚品种。比如，位于非洲东北部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红海，以高水温和高盐含量著称，其海面平均水

温在21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一般情况下，在海水温度达到30摄氏度时，珊瑚就容易出现白化现象。不过，科学家们确认，红海北部特有的400多种珊瑚，可以长期在32摄氏度甚至水温更高的海水中生存，并且保持健康。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正在尝试通过基因改良等方式培育超级耐热品种。截至2023年8月，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培育出超300万个改良珊瑚受精卵，并将其放置在国家海洋模拟器(SeaSim)中“养育”，以待未来在海洋中“播种”。

然而，此种方法却面临一个大问题——“供不应求”。根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所测算，如果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预计70%至90%的珊瑚礁会消失；如果在2050年前上升2摄氏度，世界上绝大部分珊瑚礁都将死亡。但是，“当前全球每年‘生产’的珊瑚面积仍小于10个标准足球场。仅从大堡礁修复工作进展来看，现有的珊瑚幼虫远远不够。”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修复项目成员Cedric Robillot表示。

截至目前，虽然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东部赤道海域继续减弱，但全球海面平均温度总体仍然“异常偏高”。今年4月，北纬60度至南纬60度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已经高达创纪录的21.04摄氏度。就此，Cedric Robillot担忧地表示，无论是珊瑚自身进化速度还是人类研发推进速度，都难以跟上全球气温变化的脚步，“我们可能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买一些时间’”。

在巴拿马最高峰巴鲁火山脚下的一家酒店内，一款款在火山脚下“土生土长”的瑰夏咖啡豆被研磨、冲泡，争相取悦来自世界各地评委的味蕾。

第28届“巴拿马最佳”咖啡生豆大赛日前在巴拿马西部城市博克特落下帷幕。产自本地庄园的180款咖啡生豆经巴拿马国内评委初审筛选后交由国际评委评分，最终按分数排序产生各组别冠军。

“巴拿马最佳”咖啡生豆大赛起始于1996年，是最早的国际咖啡生豆比赛之一，由巴拿马精品咖啡协会主办。每年比赛结束后，“冠军豆”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开放竞拍。

在今年比赛中，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业界人士。巴拿马精品咖啡协会主席亨特·特德曼告诉记者，近年来参与大赛的中国评委、买家和消费者越来越多，充分体现出巴拿马咖啡在中国市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比赛的21名国际评委中有多名中国评委，代表买家品尝巴拿马咖啡风味的客席评审团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咖啡业人士，还有一些中国咖啡爱好者特意赶来，参加这一一年一度的咖啡盛会。

来自深圳的郭锦已经是第七次受邀担任大赛国际评委。她12年前进入精品咖啡行业，是国内一个精品咖啡连锁品牌的主理人。郭锦告诉记者，亚洲市场是巴拿马瑰夏咖啡豆的主要市场，随着近年来中国咖啡市场迅速增长，巴拿马咖啡界愈加重视与中国客户的关系。

郭锦说，她的品牌在广州、深圳等地拥有十几家咖啡馆，每年从巴拿马进口的瑰夏咖啡豆贡献了品牌近一半销售额。“瑰夏咖啡豆有着茉莉花、佛手柑和甜橙等主体风味，与中国人的爱喝茶风味比较接近，因此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

同样来自深圳的王宗心是本届大赛的客席评审，6年前进入咖啡行业。在他看来，巴拿马瑰夏咖啡豆除了在风味上与中国的茶有诸多相通之处外，其手冲的冲泡模式也与茶文化相近，满足了年轻人对新鲜感的追求，因此成为中国年轻消费群体的“心头好”。

目前，中巴精品咖啡贸易的主要模式是从巴拿马进口咖啡生豆，在国内烘焙后再进行销售。不过，也有中国企业参与到巴拿马瑰夏咖啡豆的生产环节。

前来观摩本届比赛的正谷集团董事长张向东告诉记者，他的公司在国内主要经营有机食品，目前正与巴拿马庄园合作生产有机瑰夏咖啡豆，再拿到国内市场销售。

张向东说，公司在巴拿马博克特产区有两处种植地块，咖啡农会在地块内采用可持续方式种植有机咖啡豆，如混种当地乔木为咖啡树遮阴挡风，或是利用食虫鸟类、寄生蜂和真菌等生物防治方法控制虫害，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特德曼表示，中国消费者已成为巴拿马瑰夏咖啡豆最重要的消费群体之一。为推动咖啡出口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巴拿马精品咖啡协会近年来专门在几个主要国家市场注册了“巴拿马瑰夏”商标，中国就是最早完成商标注册的市场之一。(据新华社电)

陈昊佳